

## 陳仁錫及其《楚辭》眉批考探\*

陳煒舜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

### 引言

兩漢以來，揚雄、班固、顏之推、朱熹等人指摘屈原露才揚己，顯暴君惡，過於中庸。在君主極權、理學獨大的明代前期，屈作的刊印、楚騷的討論皆乏人問津。直至弘治、正德之際，心學興起，帝王荒政，經濟發展，《楚辭》研究的情況也逐漸興盛。萬曆開始，評點之風流行。就《楚辭》而言，馮紹祖所刊觀妙齋《楚辭章句》、陳深雙色套印白文《楚辭》、《諸子品節·屈子》、張鳳翼《楚辭合纂》、林兆珂《楚辭述註》、戈汕、毛晉《屈子》、閔齊伋《評點楚詞》等書皆是。考其形式，不外條例、圈點、眉批、側批、總評、集評等等。萬曆、天啟時，陳仁錫先後編印《古文奇賞》及《諸子奇賞》，二書皆有評注《楚辭》的部份。《諸子奇賞》的《楚辭》部份更曾獨立流傳，名為《屈子奇賞》。不過，由於二書篇幅巨大，兼以清代以後幾未重刊，往往不為人知。兼以陳仁錫早年為文頗受性靈派影響，釋褐後又身居翰林，濡染臺閣文風，然當今學者注意猶有不足。職是之故，本文首先介紹其生平著述，爬梳其文學思想，以收知人論世之效；繼而以《古文奇賞》及《諸子奇賞》眉批為中心，考探陳仁錫《楚辭》研究的內涵，以見其如何在屈騷的相關論述中呈現其文學思想。

### 陳仁錫生平及著作概述

陳仁錫，字明卿，號芝臺，長洲（今蘇州）人。父允堅為萬曆二十三年（1595）進士，歷知諸暨、崇德二縣。仁錫生於明神宗萬曆九年（1581）。十七歲，舉萬曆二十五年（1597）鄉試。聞武進錢一本善《易》，往師之，得其指要。久不第，益究心經史之學，多所論著。天啟二年（1622），始得殿試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三年（1623），丁內艱。服闋，起故官，尋直經筵，典誥敕。魏忠賢冒邊功，矯旨錫上公爵，給世

---

\* 本文蒙胡維、馮開二女士代為檢核資料，多有助益；初稿發表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主辦之「詮釋、比較與建構：中國古代文學理論國際學術研討會」（2010年5月28-29日），得李慶教授、黃靈庚教授指正；復得匿名審查者給予寶貴建議，謹致謝悃。

券。仁錫當視〈鐵券文〉草，持不可。魏黨以威劫之，仁錫堅拒曰：「自有視草者，何必我？」不數日，仁錫里人孫文豸以誦〈步天歌〉遭捕下獄，供詞連及仁錫及文震孟，罪將不測。有密救者，仁錫得削籍歸。崇禎改元，召復故官。進右中允，署國子司業事，再直經筵。以預修神、光二朝實錄，進右諭德，乞假歸。崇禎九年（1636），即家起南京國子祭酒，甫拜命而得疾卒，年五十六。福王時贈詹事，諡文莊。天啟二年，陳仁錫與同鄉文震孟皆入翰林，《明史》謂二人皆「老成宿學」，「海內咸慶得人」。<sup>1</sup>陳仁錫少而好學，中歲考取探花，身居翰林，又與文震孟交誼甚深，與王鐸、黃道周、倪元璐、鄭之玄等以清流自居，時人目為東林黨人，故於天啟、崇禎間頗為知名。陳氏原籍所居曰無夢園，《百城煙水》云：「無夢園，在孔夫子巷。陳太史芝臺諱仁錫公別墅，其自署齋聯云：『流水之間心自得，浮雲以外夢俱無。』」中有息浪、見龍峰諸勝。<sup>2</sup>可略見其襟抱。陸雲龍所編《十六名家小品》，陳氏即為其一。朱彝尊《明詩綜》、陳田《明詩紀事》等皆錄有其詩作。仁錫長子名濟生，字皇士，少師黃道周、劉宗周。明亡後隱居奉母，著書甚多，編有《啟禎遺詩》，所收多忠臣義士之作。卒後門人私諡節孝先生。<sup>3</sup>

《明史》本傳稱陳仁錫「講求經濟，有志天下事，性好學，喜著書，一時館閣中博洽者鮮其儔」。<sup>4</sup>陳氏著作繁富，存目於《四庫全書總目》者即有十一種之多。四庫館臣論其《易經頌》：「大抵據文臆斷之處多，而研究古訓之處少，蓋仁錫文士，於經學本非專門也。」<sup>5</sup>非僅如此，陳氏所纂《八品函》，選錄作品涵蓋詩賦書啟、子史佛道等書，而皆以辭章賞論為主。可見陳氏以文學角度閱讀、研究文籍的取向。其著作知見者今仍不在少數，今據《明史·藝文志》、《四庫全書總目》、《蘇州府志》等簿錄，表列如下：

表一：陳仁錫著作一覽

序號	書名	存佚	備注
1	《易經疏義統宗》三卷	存	
2	《義經易簡錄》八卷附《繫辭十篇書》十卷	存	
3	《易經頌》十二卷	存	
4	《大易同患淺言》二卷	待考	
5	《重校注釋古周禮》六卷	存	又名《周禮句解》

<sup>1</sup> 張廷玉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7394-95。

<sup>2</sup> 徐崧、張大純（纂輯）：《百城煙水》（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9年），頁193。

<sup>3</sup> 李銘皖（修）、馮桂芬（纂）：《蘇州府志》（臺北：成文出版社影印清光緒九年〔1883〕刊本，1970年），卷八七，頁2104。

<sup>4</sup> 《明史》，頁7395。

<sup>5</sup> 永瑢等：《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頁64。

表一（續）

序號	書名	存佚	備注
6	《考工記句解》一卷	待考	
7	《周禮五官考》一卷	存	
8	《周禮合解》十八卷	存	又名《周禮注疏》
9	《四書考》二十八卷附《考異》一卷	存	
10	《四書語錄》一百卷	待考	
11	《四書析義》十卷	待考	
12	《四書衍疑》十卷	待考	
13	《四書備考》八十卷	待考	
14	《中庸淵天紹易測》六卷	待考	
15	《孝經小學詳解》八卷	待考	
16	《五經旁注》十九卷	存	
17	《五經疏義統宗五種》十二卷附《周禮》二卷	存	
18	《六經圖考》三十六卷	待考	
19	《考古詳訂遵韻海篇朝宗》十二卷	存	
20	《國史日錄》四十卷	待考	
21	《皇明世法錄》九十二卷	存	
22	《刑曹》五卷	存	
23	《壬午書》二卷	待考	
24	《漕政考》二卷	待考	
25	《八編類纂》二百八十五卷《八編類纂圖》二卷《六經圖》六卷	存	
26	《堯峰山志》六卷	存	
27	《西湖月觀》一卷	存	
28	《全吳籌患預防錄》四卷	存	
29	《籌邊圖說》	待考	
30	《諸子奇賞》前集五十一卷、後集六十卷	存	
31	《潛確居類書》一百二十卷	存	
32	《白松堂集》	待考	
33	《無夢園初集》三十四卷	存	
34	《無夢園遺集》八卷	存	
35	《翠娛閣評選陳明卿先生小品》二卷	存	為明陸雲龍編《十六名家小品》三十二卷之一家
36	《古文彙編》二百三十六卷	存	
37	《古文奇賞》二百零一卷	存	計《初集》二十二卷、《續集》三十四卷、《三集》二十六卷、《四集》五十三卷、《明文奇賞》四十卷、《廣文苑英華》二十六卷

表一(續)

序號	書名	存佚	備注
38	《蘇文奇賞》五十卷	存	
39	《蘇雋》五卷	存	
40	《西漢文定》六卷	存	
41	《八品函》二十三卷	存	計《詩品彙函》四卷、《賦品烏函》二卷、 《文品芾函》三卷、《書品同函》二卷、 《啟品有函》二卷、《史品赤函》四卷、 《子品金函》四卷、《逸品繹函》二卷
42	《皇明策程文選》六卷	存	
43	《尺牘奇賞》十五卷	存	
44	《國朝詩餘》五卷	存	

除了上述四十四種著作之外，陳仁錫還重編或評閱《國語》、《史記》、《漢書》、《後漢書》、《三國志》、《資治通鑑》、楊甲《八編經世類纂本六經圖》、真德秀《大學衍義》、胡廣《周易大全》、邱濬《大學衍義補》、詹淮《性理綜要》(一名《性理標題彙要》)、薛應旂《甲子會紀》等書。

### 陳仁錫文學思想考略

晚明陸雲龍所編《十六名家小品》，可謂倡導性靈作者的一部選集。陳仁錫於書中位列一家，與屠隆、徐渭、董其昌、湯顯祖、黃汝亨、王思任、袁宏道、曹學佺、陳繼儒、袁中道、鍾惺等人並列。這些作者有七子派者(如屠隆)，有性靈說先驅者(如徐渭)，有公安派者(如袁氏兄弟)，以及其他才士名流。四庫館臣謂陸氏此書「大抵輕佻猥薄，不出當時之習」，<sup>6</sup>雖主要就編選者陸氏而論，然亦涉及諸家之文學取向。黃卓越指出，學界長期以來習慣於以「師古」與「師心」二派的衝突作為中晚明文學發展的主線，然後將人物悉作刻板的歸類，或歸於「師古」一派，或歸在「師心」一派。雖然這一說明性的界限在許多情況下可以得到證明，因此也還是可以應用的，但絕對化之後，便會大大壓縮了現象的豐富性。師心說的主要概念在於「性靈」。正如黃氏所言，這個概念在屠隆、李維楨、王世懋、王世貞等人處已間有使用，而一般學術界論述性靈說，主要以公安派和竟陵派的思想為主。<sup>7</sup>觀此十六位小品作者，他們對於性靈的看法雖各有差異，在當世卻畢竟呈現出「師心」的傾向。陸雲龍評陳仁錫小品文云：

<sup>6</sup> 同上注，頁1765。

<sup>7</sup> 黃卓越：《明中後期文學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頁213，238。

澹色清香，悠然自遠。（〈張澹斯文集序〉）  
筆有雲煙，生機滿紙。（〈剡溪記〉）  
詩書山水，樂有主人。分竹分蓮，可以無夢。（〈再出山與相知書〉其三）  
四時有湖，而獨詞春，猶是紅粉心長。（〈題春湖詞〉）<sup>8</sup>

今人劉紅虹亦認為陳氏為文好「字排句比」，其小品中有「動態美」，反映出「閑士雅致生活」。<sup>9</sup>陳仁錫擔任館閣重臣以前，長期困於科場，故當世流行的性靈師心之說對他不無影響。李贄云：「性格清洩者音調自然宣暢，性格舒徐者音調自然疏緩，曠達者自然浩蕩，雄邁者自然壯烈，沈鬱者自然悲酸，古怪者自然奇絕。有是格，便有是調，皆情性自然之謂也。」<sup>10</sup>李贄、三袁等鑑於前後七子擬古之弊，強調情性亦即天真自然的趣味，故無論其文的格調是宣暢、疏緩、浩蕩、壯烈、悲酸、奇絕，都繫於作者的本性內涵，只要是發於自然的天真之音，即是佳作。袁宏道更倡言「獨抒性靈，不拘格套」，<sup>11</sup>便是連章法也不要了。

袁中道晚年則就文壇風氣的變化作出了較為持平的審視批判：「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趨於俚又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法律救性情之窮。法律之持，無所不束，其勢必互同而趨浮；趨於浮又將變矣，作者始不得不以性情救法律之窮。夫昔之繁蕪有持法律者救之；今之剽竊，又將有主性情者救之矣，此必變之勢也。」<sup>12</sup>此處所言主性情性即三袁師心說一派，主法律者即七子師古說一派，兩派的主張看似扞格，實可兼容並蓄。僅主性情者文趨於繁蕪，僅主法律者文趨於剽竊。所謂「言之有物」、「言之有序」，性情即物，法律即序，二者不可偏廢。

然陳仁錫入翰林後，飽讀中秘之書，文風亦有所改變。何偉然云：「玄宰〔董其昌〕、侗初〔張鼐〕、明卿三太史，或以沖淳，或以娟好，或以淵滋，皆玉局妙才，自稱仙手。陳之如瑚璉之在宗廟，望之如肅度珂玉而前，味則玉饋之酒，美如肉，色則碧瀾丹巘，寸寸秋容，真所謂巖嶺高而雲霞氣鮮，林藪深而蕭瑟音清者矣。且明卿道開目廣，揭無盡之藏，磨人鈍眼，懸書滿世，天宇為闢，功猶非渺。」<sup>13</sup>對陳仁錫評注古文、編撰圖書之功大為稱許，並以「淵滋」一語褒表其文。觀當時葉向高身為臺閣大老，時代又處於前後七子之後，與公安三袁同時，故能總結師古、師心二說

<sup>8</sup> 陸雲龍（編）：《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崇禎六年（1633）陸雲龍刻本（臺南縣柳營鄉：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年），頁506，530，537，542。

<sup>9</sup> 劉紅虹：〈晚明山水遊記小品文試論〉，《益陽師專學報》1993年第3期，頁36-37。

<sup>10</sup> 李贄：《焚書》（北京：中華書局，2008年），卷三〈讀律膚說〉，頁132-33。

<sup>11</sup> 袁宏道（著）、錢伯城（箋校）：《袁宏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敘小修詩〉，頁188-89。

<sup>12</sup> 袁中道（著）、錢伯城（點校）：《珂雪齋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花雪賦引〉，頁459。

<sup>13</sup> 何偉然：〈皇明十六名家小品序〉，載《皇明十六名家小品》，頁146-47。

之失。<sup>14</sup>與葉向高一樣，陳氏身居翰林，故何偉然目之為臺閣作家；而其中進士前久困場屋，強調文章技法，故其文學思想有多元化的傾向。因此，本節從經世之用、和平之思、正側俱佳、有情有法四方面討論陳仁錫的文學思想。

### 經世之用

身居翰林的陳仁錫繼承了臺閣傳統，對於明初開國元勳劉基、宋濂的作品非常推崇：「自古人文之盛，未有踰本朝者也。文成一出即沉毅，文憲立談即雍雅。……長謀略則文成參帷幄，擅國華則文憲總儒學。」正因劉、宋二人，一運籌帷幄，一領袖儒林，故發為文章，沉毅雍雅。陳仁錫還引用明宣宗〈賜儒臣詩〉云：「朝廷治化重文教，旦暮切磋安可無？諸儒志續漢仲舒，豈直文采凌相如？」<sup>15</sup>足見陳氏遵循了官方對於文學功用的規範，以為人臣要像董仲舒一般贊翊國君推行儒術才算盡責，不能徒以司馬相如般含筆腐毫、藻飾太平為務。這與當時臺閣大老葉向高的見解頗為接近：「吾以為文章，神明之所寓也，萬有之所肖也，名物事變之所綜也，忠臣孝子、奇人高士微情奧衷之所托也。」<sup>16</sup>在葉氏看來，文章地位所以崇高，乃因其為天地造化所憑藉，故能描摹萬有，窮究事理，寄託了忠臣孝子、奇人高士的思想情感。換言之，作為詞臣者，始終沒有把文章的意義局限於「獨抒胸臆」，卻是依舊強調其社會功能、教化作用。

對於當世之文，陳仁錫在〈萊陽左進士稿序〉中有如此論述：「文章之道，孔子概之學《詩》。興觀，象也；樂群，儀也；怨慕，衷也；忠孝，性也；辨物，名也。文之可喜者多而可怨者少，可以悅耳目者多而可以事君父者少。」<sup>17</sup>陳氏之語，乃是從《論語·陽貨篇》櫟括而來：「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興觀，象也〕，可以群〔樂群，儀也〕，可以怨〔怨慕，衷也〕。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忠孝，性也〕。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辨物，名也〕。」陳仁錫所謂文之可怨者，便是「可以事君父者」，亦即不平則鳴，出於對君上的戀慕而就朝政表達衷誠的作品。至於可喜者，就是「可以悅耳目者」，亦即休閒娛樂、愉情怡性的文字。

明代中葉後，篇幅短小而內容雋永、展現人生閒情逸趣的小品文興起。這些小品文大都信手信腕，直抒胸臆，短小而流麗清新。作品形式上沒有一定的章法，內容上也非代聖人立言。陳仁錫本人纂有《尺牘奇賞》，其小品又為陸雲龍編為二卷，

<sup>14</sup> 詳參陳焯舜：《屈騷纂緒》（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8年），〈葉向高及其楚辭論探蹟〉，頁120。

<sup>15</sup> 陳仁錫：《無夢園初集》，《續修四庫全書》影印明崇禎六年（1633）張一鳴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馬集四〈明文奇賞序〉，頁596，597。

<sup>16</sup> 葉向高：《蒼霞草》，《四庫禁燬書叢刊》影印明萬曆刻本（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年），卷六〈黃離草序〉，頁48。

<sup>17</sup> 陳仁錫：《無夢園初集》，馬集三〈萊陽左進士稿序〉，頁549。

亦是箇中作手。他並不反對作文要可喜、悅耳目，只是認為當世具有可怨、事君父功效的作品較少。陳氏甚至以西漢為例，提出「政事即文章」的說法：「一切西漢之政事，皆西漢之文章。〔劉〕歆所移讓，豈政事遠遜，故托文章以寫不平之感耶？多士倘雕虫自薄，何關世風？……無政事，焉得有文章？」<sup>18</sup>在陳仁錫看來，西漢的士大夫皆有心於國是，並非一味以舞文弄墨為務。如劉歆在仕途上不得志，才會撰寫〈移讓太常博士書〉。因此，政事乃是文章寫作的肇因和基礎。陳氏又謂古今文章家「能使民作鄒魯」，<sup>19</sup>亦是此意。

### 和平之思

陳仁錫身當師心說盛行之世，非常看重性情。陳氏所推崇的性情為何？他認為，主要在於一個「真」字：「文章真無古今矣。真則可今可古。」<sup>20</sup>可知其以「真」為基點，不以古廢今，主張一代有一代之文，受到了師心說的影響。不過，「真」是有一定標準的。其〈春秋同門稿序〉論曰：「文以性情貴，得百才士不如得一性情之士。何以知性情之士？其文不遠於性情者是。本朝得性情之正莫如薛敬軒先生，得性情之達莫如王陽明先生，得性情之端莫如陳白沙先生，皆吾師云。」<sup>21</sup>薛瑄《讀書錄》雖有論文之語，本人卻並不以能文著稱。王陽明早年以辭章知名，然悟道以後即視詩文為小道而不為。唯陳獻章之詩崇尚理性，追求理趣，尤其是力主性情與自然的取向，對晚明詩壇有一定的影響。<sup>22</sup>

當然，陳仁錫將薛瑄、陳獻章和王陽明三位理學宗師視為性情之士，似乎落入儒家思想的窠臼，泯滅了文學創作與思想著作的界線，但他將正、達和端視為性情之極致，卻亦可放諸文學創作。《禮記·玉藻》：「目容端。」孔疏：「目宜端正不邪睇而視之。」《尚書·洪範》：「無偏無陂，遵王之義。」偽孔傳云：「偏，不平；陂，不正。言當循先王之正義以治民。」<sup>23</sup>故所謂端、正，本義指姿勢、型態的不偏不陂，引伸成思想行為的無反無側之意。又《尚書·舜典》：「明四目，達四聰。」偽孔傳云：「廣視聽於四方，使天下無壅塞。」又〈中庸〉：「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孔疏：「『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者，言情慾雖發而能和合，道理可

<sup>18</sup> 同上注，〈代觀風序〉，頁 538。

<sup>19</sup> 同上注，〈傅三雨詩序〉，頁 546。

<sup>20</sup> 同上注，〈黃慎軒先生集序〉，頁 519。

<sup>21</sup> 同上注，〈春秋同門稿序〉，頁 517。

<sup>22</sup> 王忠閣：〈陳莊體及其在明代詩壇的歷史地位〉，《河南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5期，頁 89。

<sup>23</sup> 《禮記正義》，《十三經注疏》本（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清嘉慶二十年〔1815〕南昌學府刊本，1985年），頁 569；《尚書正義》，《十三經注疏》本，頁 173。

通達流行，故曰天下之達道也。」<sup>24</sup>達即暢通流行而無壅塞之意。不偏不陂、通達無礙，便是陳仁錫對文章性情的要求。

故此，陳仁錫在〈擬鹽臺觀風後序〉中提到，「竊計文章淳漓之故，不越『和平』兩言」。〈玉稠山房大題選序〉亦指出，佳作一定要有「和平之思」：「文章之道，太上神聽和平，其次終風暴笑，顧我則笑。使不和不平、暴而不笑，則無有宇宙，安有文章？今詩家擬陶者日侈，未必陶也。然何以不學李、學杜、學漢、學魏而學陶？蓋猶有和平之思焉。」<sup>25</sup>《詩·小雅·伐木》：「神之聽之，終和且平。」鄭箋云：「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誠求之，神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相與和而齊功也。」<sup>26</sup>由此可知，陳仁錫認為上佳的文字，要有中正和平的思想、敦睦倫誼的功用，亦即「得性情之正」者。（有關〈終風〉，下文再論。）

在陳仁錫看來，陶淵明的作品便符合了「得性情之正」的條件。昭明太子〈陶淵明集序〉云：「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遇謂之逆旅。宜乎與大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於憂畏，汲汲役於人間！」<sup>27</sup>認為陶淵明之所以能自適自得，樂天知命，就是以「隨中和」為基礎的。葉向高也將性情與和平之思結合論述，認為人只有治世才會得性情之和，創作中正和平的詩歌：「昔師乙之對子貢曰：『其人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斯所謂君聲者與！言之不足而長言之，其本乎性情者耶？」<sup>28</sup>葉向高指出，人們處於不同的歷史階段，會有不同的性情和感觸，因此無論盛世還是衰世，都會產生詩歌，只不過性情抒發的方式不太一樣。

袁宗道在〈讀淵明傳〉中更論道：「淵明夷猶柳下，高臥窗前，身則逸矣；瓶無儲粟，三旬九食，其如口何哉？今考其終始，一為州祭酒，再參建威軍，三令彭澤，與世人奔走祿仕，以饜饒吻者等耳。觀其自薦之辭曰：『聊欲絃歌，為三徑資。』及得公田，亟命種秫，以求一醉。由此觀之，淵明豈以藜藿為清，惡肉食而逃之哉？……然自古高士，超人萬倍，正在見事透徹，去就瞥脫，何也？見事是識，去就瞥脫是才，其隱識隱才如此，其得時而駕，識與才可以推也。」<sup>29</sup>正如李贄所說，「穿衣吃飯，即是人倫物理」。<sup>30</sup>要葆全真性，並非餐風飲露，不食人間煙火，而是洞明練

<sup>24</sup> 《尚書正義》，頁43；《禮記正義》，頁879。

<sup>25</sup> 陳仁錫：《無夢園初集》，馬集三〈擬鹽臺觀風後序〉，頁554；〈玉稠山房大題選序〉，頁541。

<sup>26</sup> 《毛詩正義》，《十三經注疏》本，頁327。

<sup>27</sup> 蕭統（著）、俞紹初（校注）：《昭明太子集校注》（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199。

<sup>28</sup> 葉向高：《蒼霞草》，卷五〈穀城山館詩敘〉，頁36。

<sup>29</sup> 袁宗道（著）、錢伯城（標點）：《白蘇齋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讀淵明傳〉，頁188-89。

<sup>30</sup> 李贄：《焚書》，卷一〈答鄧石陽〉，頁4。

達於人倫物理，發而中道。李贄為袁氏之師，陳仁錫亦曾替其《藏書》及《續藏書》作序，譽為衡鑑、蒼龜，<sup>31</sup>故李贄之見及袁宗道對陶淵明的推崇，從旁佐證了陳仁錫「今詩家擬陶者日侈」之說。而袁氏從「非於酒肉不動心、於出處無權衡」的入世角度詮釋陶淵明，也為陳仁錫將作為隱士的陶淵明與儒家人倫扣上關係，進而強調陶詩的「和平之思」合乎儒家的中庸思想。

陶淵明之外，陳仁錫對於屈原的性情也非常推崇，如他稱許《累瓦編》的作者吳安國（托翁）云：「高冠長劍，中情好修，傲立於冰崖雪嶺間，發為文詞，爾雅深醇。抑先生愛《楚詞》滋蘭樹蕙，將効之國家耳？遍上下而求索，思自達於君而不可得，且柰之何？」<sup>32</sup>陳仁錫以為，如屈原般中情好修，愛國忠君，發為文章方能爾雅深醇。換言之，文章雅醇和平，就是性情的最佳體現。

### 正側俱佳

陳仁錫強調文學的社會功能，推崇性情之正，體現出其作為臺閣文臣的精神面貌。進而言之，由於長期受到師心性靈之說的影響，對於有真性情而未必得其正的文學作品，陳仁錫也有所肯定。其〈累瓦編序〉云：「文章之道，情性為主。知塗巷之歌可風，不知可雅可頌，皆是物也。」<sup>33</sup>陳仁錫認為，無論廟堂之雅頌，還是塗巷之風，只要是發乎性情的作品，便無須判其高下。故此，陳氏才會如前文所說，認為文章之道是：「太上神聽和平，其次終風暴笑，顧我則笑。使不和不平、暴而不笑，則無有宇宙，安有文章？」又《詩·邶風·終風》：「終風且暴，顧我則笑。」孔疏云：「言天既終日風，且其間有暴疾，以興州吁既不善，而其間又有甚惡，在我莊姜之傍，顧視我則反笑之，又戲謔調笑而敖慢，己莊姜無如之何，中心以是慍傷。」<sup>34</sup>此詩以傷悼州吁不善為主旨，自不能列於正風。而陳仁錫卻以其描寫「暴疾」、「虐浪」之態頗為傳神，仍視為佳文章。

和平之思等而下之，便是性情暢達卻未必得其正者。觀袁中道〈感懷詩〉有云：「山村松樹裡，欲建三層樓。……右手持《淨名》，左手持《莊周》。下層貯妓樂，置酒召冶遊。」<sup>35</sup>左東嶺據而闡釋道，公安派文人求佛道以自我解脫的願望，有讀書吟詩的精神享受，更有聽歌狎妓的感官快活。欲集所有快活於一身，此乃公安派自適人生理想的特徵。<sup>36</sup>在傳統儒家將「德」、「色」置於對立面的語境中，推舉聲色等

<sup>31</sup> 陳仁錫：《無夢園初集》，馬集四〈藏書序〉，頁603。

<sup>32</sup> 同上注，馬集三〈累瓦編序〉，頁551。

<sup>33</sup> 同上注。

<sup>34</sup> 《毛詩正義》，頁79。

<sup>35</sup> 袁中道：《珂雪齋集》，〈感懷詩五十八首〉其十，頁192。

<sup>36</sup> 左東嶺：《明代心學與詩學》（北京：學苑出版社，2002年），頁275。

肉體享樂自然不可謂「正」。陳仁錫崇正而不廢側，似乎與公安派有類近之處。不過作為臺閣文臣，他始終認為，性情呈現於文字之時，不能肆意而發，還是需要有所剪裁：「兩司馬，才情一也。子長情至，長卿情侈。夫能使人主讀之凌虛，而文章之道不尊。」<sup>37</sup>陳氏舉司馬遷和司馬相如為例，指出二人皆才情兼備，而司馬遷在書寫《史記》時，恰如其分地投注了性情，如斯便足；司馬相如作為賦體，鋪張揚厲，靡麗閎衍，其〈大人賦〉勸百而諷一，使漢武帝讀後飄飄有凌雲之志，情性過於中正，如此即是「侈」。

除了要避免「侈」，陳仁錫又提出文章要「正側俱佳」：「嘗論文字如美人，浮香掠影，皆其側相。亦須正側俱佳。今文字日媚日薄，可斜視不可正觀，如美人可臨水不可臨鏡。」<sup>38</sup>所謂「側」即不正，如《南史·袁湛傳》云：「為文惠太子作〈楊畔歌〉，辭甚側麗。」又如《舊唐書·溫庭筠傳》云：「能逐絃吹之音，為側豔之詞。」<sup>39</sup>側麗、側豔皆有綺靡浮豔的含義，亦即陳仁錫所說「日媚日薄」的文風。陳仁錫強調「正」，卻也不反對「側」；但在四庫館臣看來，自然就「輕佻猥薄」了。

### 有情有法

儘管陳仁錫非常看重性情，甚至對於〈終風〉等未得性情之正的作品也有所肯定，但他並未忽視文章律法的重要性。明代中後期的茶陵派、前後七子皆注重詩文的格調。陳國球認為，明代復古派詩論要復古，目的是希望通過向古代傳統學習，以求達到與古代盛世詩歌同樣的水平。廖可斌則謂明代復古派重視詩歌的調，即情感、文采、音韻等方面的主張，來批評理學家文學觀及詩歌的理化傾向；同時又以強調詩歌的格，即思想內容、法度和語言等方面的主張，來反對詩歌中的俗化傾向。<sup>40</sup>非僅詩歌，文章亦然。袁宏道「不拘格套」的主張，顯然是站在七子對立面而發。比勘之下，陳仁錫的看法與七子派較為接近。

陳氏常常把文章和武備相提並論，如〈續古文奇賞序〉云：「文，兵也。兵，禮也。……蓋武事之不張，繇文心之不足。故兵以武為植，以文為種。兵法有之：『人人、正正、辭辭、火火。』又曰：『世能祖祖，鮮能下下。』夫火火，文士之武心也。下下，武士之文心也。」<sup>41</sup>陳氏所引兩段資料出自《司馬法》及《黃石公三略》。所謂「人

<sup>37</sup> 陳仁錫：〈爨瓦編序〉，頁 551。

<sup>38</sup> 陳仁錫：《無夢園初集》，馬集三〈冒宗起詩草序〉，頁 568。

<sup>39</sup> 李延壽：《南史》（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 709；劉昫等：《舊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 5079。

<sup>40</sup> 陳國球：《明代復古派唐詩論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頁 300；廖可斌：《明代文學復古運動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頁 115。

<sup>41</sup> 陳仁錫：《無夢園初集》，馬集四〈續古文奇賞序〉，頁 593。

人、正正、辭辭、火火」，李零認為是「人必得其人、正必得其正、辭必得其辭、火必得其火」之義。而「世能祖祖，鮮能下下」，吳樹平則解釋為「以尊祖之禮祭祀祖先」及「愛撫下民」之義。<sup>42</sup> 陳仁錫將「火火」詮釋為文士以筆翰操生殺權，亦即其〈傅三雨詩序〉中所謂「擊強」。<sup>43</sup> 將「下下」詮釋為武士雖能奮勇殺敵卻仍有謙遜之心。

陳氏又把兵法比喻為文法：「世人不識，曰文必莊、馬，兵必孫、韓。裂文法與兵法為二，譬之木人舞中節拍，舞罷索然，奚法以示人？」對於文法，陳仁錫提出過一些意見，如其引用庾信論詩之言曰：「寧律不諧，不使句弱；寧字不工，不使語俗。」<sup>44</sup> 若詩句過於和諧悅耳，就會產生優美柔弱之感；用字如果俗白，則可能令作品流於俚俗。

陳氏更論俚俗道：「〔自古〕有小心之文，無放膽之文。放膽者，其文必俚。」<sup>45</sup> 所謂「放膽者」不知是否意有所指，然其論與前引袁中道「性情之發，無所不吐，其勢必互異而趨俚」的看法是非常接近的。又如「用奇不用偶」：「〔文章之道〕用奇不用偶，文用偶而極弱。……夫始于奇、終于奇、餘于奇，一篇總是乾局，故單提也，單收也，數行不整齊也，皆用奇之妙也。」<sup>46</sup> 所謂奇句，就是不對偶的句子。「始于奇」即單提，予人先聲奪人之感；「餘于奇」即數行不整齊，有奇崛挺拔之勢；「終于奇」即單收，可在篇末營造出高潮。

文章技法對於士子的時文寫作有直接的參考價值，晚明趙南星、葉向高等人皆有所論述，陳仁錫亦然。如其〈小題先範序〉即云：「今日之文，患有情而無式。……文章惟法可以御情。」陳仁錫認為，當時的文學作品雖不無真性情，卻往往沒有好的章法加以規範和駕馭。他將這種情況歸咎於當局對於士子寫作入門的文體八股文要求不足：「司文者禁淫哇而未嘗與之習風雅，怒鴟梟而未嘗與之學鸞鳳，惡稂莠而未嘗與之播嘉種，於是法長苦而情長奢。其初法不足，情有餘，究竟尺幅之內，情亦少矣。何也？法可久，情不可久也。」他批評官方並未積極對八股文的內容樹立典範，以致學子無所適從，縱有性情，卻沒有良法。加上八股文篇幅短小，性情也無法充分地呈現出來。讀者最後從作品中可以看到的，只剩下並不圓熟的技法而已。他又指出，八股文是練習文法的重要途徑：「凡事有成法，而鬼神之道行乎其間，則八比之文可與聖賢酬酢矣。」<sup>47</sup>

<sup>42</sup> 李零（譯注）：《司馬法譯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42-43；婁熙元、吳樹平（譯注）：《吳子譯注·黃石公三略譯注》（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頁61。

<sup>43</sup> 陳仁錫：〈傅三雨詩序〉，頁546。

<sup>44</sup> 同上注。

<sup>45</sup> 陳仁錫：《無夢園初集》，馬集四〈傷寒指南序〉，頁580。

<sup>46</sup> 同上注，馬集三〈吳音序〉，頁539。

<sup>47</sup> 同上注，〈小題先範序〉，頁552-53。

## 《古文奇賞》及《諸子奇賞》編纂及評注情況述略

覈諸現存文獻，陳仁錫評注之楚辭篇章共見於三處，即《古文奇賞》（後稱《文賞》）、《諸子奇賞》（後稱《子賞》）及《文品芾函》（後稱《文函》）三書。《文賞》僅收陳氏所認定的屈原作品，即〈離騷〉至〈遠遊〉二十三篇。《子賞》在《文賞》的篇什基礎上增收〈卜居〉、〈漁父〉二篇，合稱〈屈子〉，又附〈九辯〉、〈招魂〉二篇，合稱〈宋玉〉。《文函》僅收錄〈涉江〉一篇。此外，《史品赤函》（後稱《史函》）則錄有《史記·屈原列傳》。《文函》、《史函》屬《八品函》之二，編刊於崇禎年間，時代視《文賞》、《子賞》為晚。且《文函》所見楚辭作品只有一篇，《史函》所收〈屈原列傳〉刪去了〈懷沙〉、〈漁父〉部份，不能歸入楚辭作品之林，故後文僅作附論，不擬專節探討。

### 《古文奇賞》及《諸子奇賞》的編纂情況

《文賞》包括《初集》二十二卷、《續集》三十四卷、《三集》二十六卷、《四集》五十三卷、《明文奇賞》四十卷，合《廣文苑英華》二十六卷，共二百零一卷，可謂卷帙浩繁。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縮印本，初集自序題於萬曆戊午（四十六年，1618）孟冬日，二集自序題於天啟辛酉（元年，1621）長至日，三集自序題於天啟甲子（四年，1624）初夏日，而四集自序題於天啟乙丑（五年，1625）中秋日，先後相距七年，足見編纂時間之久。考陳仁錫於天啟二年得殿試第三名，授翰林院編修。三年，丁內艱。服闋，起故官，尋直經筵，典誥敕。因得罪魏忠賢而削籍，至崇禎即位，召復故官。可知陳仁錫未中進士前，已著手於《文賞》初、二集，至於三、四集，則當為丁艱時所作。

四庫館臣論《文賞》初集云：「是書初集自屈平《離騷》至南宋文天祥、王炎午，依時代編次。前有萬曆戊午自序，謂折衷往古，有一代大作手，有一代持世之文，有一代榮世之文，其目錄內即以此三者或標註人名之下，或標註篇題之旁。而於漢文中又各分類標。題或以人為類，則分天子、侯王、郡守相、皇太子、藩國、將帥，邊塞，學者。或以事為類，則分應制、薦舉、彈駁、乞休、理財、議禮、災異、籌邊、議律、訟冤、治河、策士、奏記。其最異者，又別立一代超絕學者、一代超絕才子之目。自漢以後，又改此例，仍以時代為序。體例殊為龐雜。」<sup>48</sup>查《古文奇賞略紀》云：「有大作手，如屈原等是也；有持世之文，如魯仲連等；有榮世之文，如蘇秦〈說齊閔王〉等。」<sup>49</sup>其目錄內即以此三者或標註人名之下，或標註篇題之旁。「持世」一語出自佛家，本有「住持世間安穩豐饒」、「消滅眾生一切災禍疾病」、

<sup>48</sup> 《四庫全書總目》，頁1762。

<sup>49</sup> 陳仁錫：《古文奇賞》，《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影印明萬曆四十六年（1618）刻本，初集，〈古文奇賞略紀〉，頁二下。此本之眉批時有漫漶不清處，故以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本覈之。

「能持財寶，滿世人願」等意，<sup>50</sup>至《文賞》則有維繫世道人心的涵義。如魯仲連抗秦蹈海的一番陳辭，解開了當時諸侯間的困局。榮世則為對揚王休、藻飾太平、鼓吹清明之意，如蘇秦遊說齊閔王，主要是不無奉承地在齊王面前分析齊國的形勢和利害關係，藉以達到自己的使命、謀取個人利益而已。

抑有進者，陳仁錫初集自序又云：「大作手不數，苟不能以文持世也，且勿辱乎哉！……所謂持世、榮世二種之文，可以知矣。是集也，首屈大夫，所謂大作手，亦可以知矣。」<sup>51</sup>榮、辱相對，可見陳氏認為，所收之文即使不能持世，至少也不會辱世。至於能居「大作手」之位者則非屈原莫屬，故陳仁錫《文賞》初集自序於古來芸芸作者中僅齒及屈原之名，且列其作品於卷一。

至於《諸子奇賞》，則包括前集五十一卷、後集六十卷。前集自序落款曰「丙寅孟夏古吳陳仁錫書黃河舟中」，後集自序「天啟丙寅孟冬朔日古吳陳仁錫書於燕邸」。天啟丙寅即六年（1626），而此書現存者亦僅有天啟六年三徑齋刊本，晚於《文賞》四集一年而面世。可知《子賞》亦編纂於陳仁錫丁憂期間。三徑齋主人蔣中同為《子賞》前集作〈發凡〉十則，其末則曰：「是集評選頗繁，告成匪易，本欲彙成全集行世。而海內文人一聞明卿先生《諸子奇賞》，亟欲寓目，不啻望歲。因分前後二集。前集自成周迄于先秦，先付剞劂，以供世好。後集自漢以下，刻已將半，即走力燕都候稿，以成合璧。」<sup>52</sup>觀陳氏兩集自序皆作於丙寅之年，一在孟夏四月，一在孟冬十月，且後集題曰「書於燕邸」，與蔣氏「走力燕都候稿」之語正合。此外，北京《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著錄云：

屈子附宋玉一卷

(明) 陳仁錫評選

明刻《諸子奇賞》本

一冊一函

九行二十字，小字雙行同，白口，四周單邊，雙魚尾。<sup>53</sup>

筆者至清華大學查核此書，知此書乃《諸子奇賞·屈子附宋玉》部份之單行本。

<sup>50</sup> 《佛說雨寶陀羅尼經》云：「持世菩薩能雨下無量財寶，住持世間安穩豐饒，因此名為持世。誦持其真言雨寶陀羅尼，更能獲致無量財寶，積聚如山高。」見不空（譯）：《佛說雨寶陀羅尼經》，收入《大正新修大藏經》（臺北：新文豐出版有限公司，1992年），密教部三，冊20，頁667。

<sup>51</sup> 陳仁錫：《古文奇賞》，〈自序〉，頁一下、三下。

<sup>52</sup> 蔣中同：〈諸子奇賞發凡〉，載陳仁錫：《諸子奇賞》，臺灣國家圖書館藏天啟六年（1626）三徑齋刊本，前集，發凡頁五上至五下。

<sup>53</sup> 清華大學圖書館（編）：《清華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目》（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269。

## 《古文奇賞》及《諸子奇賞》所收楚辭部份的評注概況

《文賞》初集自序作於萬曆戊午(四十六年)，《子賞》刊於天啟六年，可知二書的《楚辭》評注相去只有八年左右。《文賞》卷一所收楚辭作品，計有〈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諸篇，〈卜居〉、〈漁父〉以下不收。正文首題「古文奇賞卷之一」，下署「古吳陳仁錫評選」，二行題「離騷經」，下署「屈平」。版心白口，上題「古文奇賞」，中列篇名、卷次，下右作「屈平一」，左作「乙〔一〕」，蓋前者為屈作頁碼，後者為全卷頁碼。卷末附「音義」一卷。〈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篇末皆有後敘，蓋採王逸之說。如〈離騷後敘〉云：「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承王逸以徑訓經之見。〈九章後敘〉云：「作〈九章〉以著明之。」亦承王逸以彰訓章之舊說。此外，後敘亦或附有近人之說者，如〈天問後敘〉引陳深語云：「嘗愛曾子問〔柳子厚〕五十餘難，亦至奇之文。」<sup>54</sup>

各篇有圈點、注文、眉批、側批。圈點率為白圈(○○○)，麗文警語則標之。注文較簡略，多參考王逸、洪興祖、朱熹舊注。唯〈天問〉注文切割柳宗元〈天對〉以附之。側批以疏通文義、析論章法為主，如〈離騷〉「攬木根以結芷兮」，側批：「據根本。」「貫薜荔之落蕊」，側批：「執忠信。」「既替余以惠纒」，側批：「以芳而弃。」〈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兮未敢言」，側批：「湘夫人如芷如蘭。」〈山鬼〉「君思我兮然疑作，雷填填兮雨冥冥，猿啾啾兮狢夜鳴」，側批：「俱是然疑狀。」〈惜誦〉：「忽謂之過言」，側批：「過言奇。」亦或有批駁前人成說者，如〈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側批：「顏之推謂原為文常陷輕薄，何其謬歟！」<sup>55</sup>總體而言，側批因限於版式空間，故篇幅不廣，數量亦遠不及眉批之多。至若眉批部份，或抒己見，或徵舊說，篇幅不一，達九十餘條。卷後又附有〈楚辭音義〉。

《文賞》主旨在於探討作品章法。陳氏將古今文章分為大作手、持世、榮世之文三類，可見其對於義理、詞章二學調和彌縫的心態。所謂大作手，即義理詞章兼備者，持世之文即以義理勝者，榮世之文即以詞章勝者。再觀《子賞》，據陳仁錫自序所說，其編纂動機可謂是為義理、詞章二學的調和彌縫作進一步的努力：「學莫要乎六經，人才莫急乎經濟，文章莫貴乎雄渾博大。何以有諸子之刻？蓋欲返之於六經也。以六經收諸子，不若以諸子返六經。強其所厭，不若用其所喜。夫諸子多救時之人，然六經治未病，諸子治已病，六經治百家之病，諸子治一時之病。六經藥物皆備，而不預裁一方，病夫自取焉。諸子方太具，藥太猛，乃治己也奇，治人也拙。治一國也奇，治一世也拙。奇以方，拙亦以方。後之習諸子者，幾無疾而呻吟，類無方而操藥，又近於入虎狼之窟，採鳥喙之毒，奚取焉？」<sup>56</sup>

<sup>54</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八下、三五下、二二上。

<sup>55</sup> 同上注，頁二上、十上、十二下、二三下、七上。

<sup>56</sup> 陳仁錫：〈諸子奇賞前集序〉，頁五下至七下。

《莊子·天下》篇云：「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眾技也，皆有所長，時有所用。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sup>57</sup>《莊子》之論在班固手中有進一步的發揮。《漢書·藝文志·諸子略》既謂諸子「皆起於王道既微，諸侯力政，時君世主，好惡殊方，是以九家之術蠡出並作，各引一端，崇其所善，……今異家者各推所長，窮知究慮，以明其指，雖有蔽短，合其要歸，亦《六經》之支與流裔」，又站在儒家的立場上說：「若能修六藝之術，而觀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長，則可以通萬方之略矣。」<sup>58</sup>這種對於子書的態度，亦為後世儒者所承襲。但陳仁錫卻認為，諸子既然為六經流亞，學者亦可由諸子而返於六經。進而言之，正因為六經內容無所弗屆，就像「藥物皆備，而不預裁一方」，反而會令人困擾迷惑。而諸子各有專攻，所以更能對症下藥，只要注意其「方太具，藥太猛」、「治己也奇，治人也拙」便可。

蔣中同亦論云：「經之有子，如王必有伯，統必有閏。非伯無以扶王，非閏無以續統，非子無以翼經。則諸子固六經之功臣也。各各開闢，離奇矯異，自命千秋，儘有聖賢未發處。夫布帛菽粟，既已厭飫，則天孫禁嚮，必相搖悅。」<sup>59</sup>可見子書不僅能在義理上補充六經的不足，亦可給予慣熟於儒書文章的讀者耳目一新之感，獲得不同的審美情趣。陳氏自序又具體舉例道：「諸子中大醫王四：欲反汝情性而無繇入，老子醫怯夫一大手也，故尚補；沃之清冷之淵，莊子醫熱夫一大手也，故尚瀉；無政事則俗，管子醫俗夫一大手也，故尚法；〈離騷〉有力於《詩》亡之後，屈子醫戇夫一大手也，故尚厚。」<sup>60</sup>非但將屈原擢入諸子之林，更將其與老子、莊子、管子並列前茅。

萬曆年間，陳深《諸子品節》錄有《屈子》部份，然未說明列入子部的原因。其後題焦竑《二十九子品彙》、題歸有光《諸子彙函》等書承襲陳深體例，然皆坊賈偽託，非出於焦、歸之手，更無一字解釋之語。陳仁錫《子賞》於明代大型子部諸書中面世較晚，卻能從學理角度，指出屈騷具有思想性，乃「醫戇夫一大手」，雖出現於《詩》亡之後，卻能保持溫柔敦厚的傳統，故置屈原於諸子之列。其說雖為一家之言，卻亦有可取之處。抑有進者，《諸子品節》、《二十九子品彙》、《諸子彙函》等大型子書，編纂質量每下愈況。如四庫館臣批評《諸子彙函》中「屈原謂之玉虛子，宋玉謂之鹿谿子，江乙謂之囂囂子，魯仲連謂之三柱子」等，「改易名目，詭怪不經」，「荒唐鄙誕，莫可究詰」。<sup>61</sup>

<sup>57</sup> 郭慶藩：《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61年），頁1069。

<sup>58</sup> 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1746。

<sup>59</sup> 蔣中同：〈諸子奇賞發凡〉，頁一上。

<sup>60</sup> 陳仁錫：〈諸子奇賞前集序〉，頁五下至七下。

<sup>61</sup> 《四庫全書總目》，頁1120。

這種手法也遭到《子賞》的編者反對。蔣中同云：「今坊刻將眼前數子點綴名色，若出異書，又將一二篇章裝以巧名，令耳食者相眩詫，不亦鄙陋可嗤乎？是集惟存本來面目，弗變易塗飾以誣世。」<sup>62</sup>故《子賞》前集卷三十五之楚辭作品，〈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皆收，是為〈屈子〉；又有〈九辯〉、〈招魂〉兩篇，合稱〈宋玉〉，正乃「惟存本來面目，弗變易塗飾以誣世」之意。自陳深《諸子品節》後，《子賞》亦為首度為宋玉作品獨立設編之書。正文前有王逸〈離騷序〉，首題「諸子奇賞卷之三十五」，下署「古吳陳仁錫明卿甫評選」，二行題「屈子」，三行低一格題「離騷經」。版心黑口單魚尾，上題「諸子奇賞」，中列卷次、作者（屈平、宋玉），下有頁碼。各篇皆無前後敘，唯〈湘君〉題下雙行小注云：「此篇蓋為男主事陰神之詞，故其情意，曲折尤多。」<sup>63</sup>實乃朱熹《楚辭集注》之說。<sup>64</sup>此外亦有圈點、注文、眉批、側批，圈點用法悉同於《文賞》。注文視《文賞》為簡，如〈惜往日〉、〈橘頌〉注文寥寥，且幾乎皆為注音，〈漁父〉全無注文。〈天問〉注文則於柳宗元〈天對〉偶爾引用而已。側批甚少，性質亦近於《文賞》。如〈離騷〉「忽反顧以游目兮」，側批：「不合則去。」「恐鵝鳩之先鳴兮」，側批：「偷讒先至。」〈惜誦〉「令五帝以折中兮」，側批：「虛心。」<sup>65</sup>眉批八十餘條，以抒發己見為主，甚少徵引舊說。

#### 《古文奇賞》及《諸子奇賞》所收楚辭部份的眉批情況

蔣中同〈諸子奇賞發凡〉云：「諸子中有數種，向明卿先生摘選于《古文奇賞》，評品確當，海內久已欽服。然自校書木天館後，其大智慧通身是眼。茲集所評，片字隻句，俱出人意表，一掃向來知見，批卻導窾，悉中理解，更登峰造巔矣。」<sup>66</sup>多溢美之言，然可知《子賞》所收作者篇章與《文賞》有重疊之處，且兩書之作一始於陳氏布衣之時，一始於入翰林之後，批點之內容多有不同處。綜觀《文賞》及《子賞》二書所收《楚辭》部份，注文乃裁剪舊注而成，幾無新意，側批數量少，篇幅短，故本文之討論乃以眉批為中心。有關二書眉批情況，筆者初步作出統計，表列如下：

表二：《文賞》、《子賞》及《文函》所收《楚辭》作品眉批數量統計

《楚辭》作品	文賞	子賞	文函	重見	備注
〈離騷〉	19	26		4	《文賞》引〈惜誓〉一、〈招隱士〉一、〈七諫·怨思〉一；劉勰一、劉知幾一。
〈東皇太一〉	1				

<sup>62</sup> 蔣中同：〈諸子奇賞發凡〉，頁五上。

<sup>63</sup> 《諸子奇賞》前集，卷三五，頁四下。

<sup>64</sup> 朱熹：《楚辭集注》（臺北：文津出版社，1987年），頁2。

<sup>65</sup> 《諸子奇賞》前集，卷三五，頁三下、七下、二三上。

<sup>66</sup> 蔣中同：〈諸子奇賞發凡〉，頁三下至四上。

表二(續)

《楚辭》作品	文賞	子賞	文函	重見	備注
〈雲中君〉		3			
〈湘君〉	1	4		1	《文賞》及《子賞》重見條文字各有詳略，《文函》無重見條。
〈湘夫人〉		3			
〈大司命〉		2			
〈少司命〉		2			
〈東君〉	1				
〈河伯〉	1	1			《文賞》引魏文帝一。
〈山鬼〉	3	1			《文賞》引柳宗元一。
〈國殤〉	1	2			《文賞》引馮覲一。
〈禮魂〉	1				〈九歌〉部份，《文賞》共9條，《子賞》共18條。
〈天問〉	3	1			
〈惜誦〉	4	6			《文賞》引宋玉〈九辯〉一。
〈涉江〉	2	2	5		《文函》僅收錄〈涉江〉一篇。
〈哀郢〉	5				《文賞》引宋玉〈九辯〉一。
〈抽思〉	10	2			《文賞》引〈招魂〉一、揚雄〈反離騷〉一、〈惜誓〉一、〈大招〉一；黃汝亨一、馮覲一。
〈懷沙〉	11	3			《文賞》引〈七諫·謬諫〉一；蘇軾一、高似孫一、陳深一。
〈思美人〉	4	3			《文賞》引陳繼儒一。
〈惜往日〉	2	6			
〈橘頌〉	4	1			
〈悲回風〉	4	4			《文賞》引蘇軾二、蕭統一。 〈九章〉部份，《文賞》共46條，《子賞》共27條。
〈遠遊〉	14	4		1	《文賞》引葉盛一、王世貞三、楊慎一、沈約一、劉勰一。《文賞》所收止此。
〈卜居〉		1			
〈漁父〉		1			
〈九辯〉		4			
〈招魂〉		2			
總計	91	84	5	6	《文賞》引舊作11，舊說20，共計31條。

如前蔣中同所言，《文賞》、《子賞》二書所收篇章大率不同，重疊處則包括楚辭作品。就楚辭部份而言，蓋《子賞》編纂之意，亦為補《文賞》不足，進一步闡釋諸篇的義理、辭章。

根據上表可以了解幾點相關的情況：其一，《文賞》楚辭部份眉批達九十一條，《子賞》則有八十四條，數量甚多。兩書重見之眉批共有六條，僅佔《文賞》楚辭部份全部眉批條數的6.5%，《子賞》楚辭部份全部眉批條數的7.1%，為數甚少。換言之，兩書眉批大率皆為原創，沿襲錄者不多。其二，《文賞》楚辭部份眉批引舊作十一條，舊說二十條，計三十一條，佔全部眉批三分之一強。其中引〈九辯〉、二〈招〉、〈惜誓〉、〈招隱士〉、〈七諫〉、〈反離騷〉等楚辭作品者最多，他引魏文帝、沈約、蕭統、劉知幾、蘇軾、高似孫、葉盛、楊慎、馮覲、陳深、黃汝亨、陳繼儒等人之說，則以論騷之語為主。引用之際，亦有批駁其意者。而《子賞》楚辭部份眉批幾乎全不引用舊說，差異甚大；唯〈遠遊〉眉批引北宋羅處約〈題太湖〉詩「逢山方得地，見月始知天」二句，然此條係自《文賞》轉錄，並非原創。其三，以各篇眉批數量來看，二書條數最多者皆為〈離騷〉（《文賞》十九條，《子賞》二十六條），最少者皆為〈天問〉（《文賞》三條，《子賞》一條）。若以〈九歌〉、〈九章〉等合成一篇而觀之，則〈九章〉條數最多（《文賞》四十六條，《子賞》二十七條）。由此可以推想，對於楚辭各篇的重視程度，陳仁錫的先後次序一以貫之。其四，如〈離騷〉之眉批，除去二書重複的四條，共得四十一條，幾乎覆蓋了作品的大部分章節。再如〈雲中君〉、〈湘夫人〉、二〈司命〉篇，《文賞》全無眉批，而《子賞》皆有。

此外，二書楚辭部份的眉批情況尚有一些值得注意之處。第一，《文賞》中〈國殤〉篇首眉批云：「此篇敘殤鬼交兵挫北之迹甚奇，而詞亦淒楚。固知唐人〈弔古戰場文〉為有所本。」此實馮覲之語，首見於馮紹祖《觀妙齋楚辭集評》，<sup>67</sup>陳仁錫引用而未標出處。然全卷此例鮮見，蓋一時不慎遺漏。第二，《文賞》中，陳仁錫認為〈卜居〉、〈漁父〉並非屈原手筆，故不收。其所錄者止於〈遠遊〉。因此〈遠遊〉十四條眉批中，有一部份是兼論〈卜居〉、〈漁父〉或總論全部作品者。而《子賞》則補充了〈卜居〉、〈漁父〉、〈九辯〉、〈招魂〉四篇，四篇中評、注皆少。〈九辯〉、〈招魂〉合成附錄，題作〈宋玉〉。第三，如前表所示，二書重複之眉批僅六條而已；而眉批之議論就同篇同章而發者為數不多，也僅六條。如〈惜誦〉篇首，《文賞》眉批：「惜誦奇絕。」而《子賞》則眉批云：「忠臣之心長苦。」<sup>68</sup>更能點出此篇的思想。又〈悲回風〉首句「悲回風之搖蕙兮」處，《文賞》眉批：「忠州有屈原塔。蘇軾詩：『聲名寔無窮，富貴亦暫熱。大夫知此理，所以持死節。』第忠州〈竹枝歌序〉云：『傷二妃而哀屈原，思懷王而憐項羽。』此亦楚人之意，何其不倫哉！」這段文字實為陳深之語，見馮紹祖《觀妙齋楚辭章句·悲回風》眉批。故《子賞》即不錄此段，而眉批云：「一語模秋入神。」<sup>69</sup>

<sup>67</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十四上；王逸：《楚辭章句》（臺北：藝文印書館影印明馮紹祖萬曆丙戌〔1586〕刊本，1974年），卷二，頁十六上。

<sup>68</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二二上；《諸子奇賞》前集，卷三五，頁二三上。

<sup>69</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三三下；《楚辭章句》，卷四，頁十五上；《諸子奇賞》前集，卷三五，頁三四上。

可見陳氏在編纂《子賞》時，於舊有眉批作出甄擇取捨。第四，除前論十二條，《子賞》其餘七十二條眉批所論及的章節皆為《文賞》所未及者。相較之下，《文賞》眉批於辭章、義理皆有涉及，而《子賞》眉批則更加著眼於義理部份，尤其繼續發展了《文賞》強調屈騷地位、標舉屈原人格的工作。因此，在後文的論述中，筆者會將二書的內容合而論之，不擬另設篇幅，論其壁壘異同。

附帶一提，《文函》僅收〈涉江〉一篇，共有眉批五條、總評一條。《文函·自序》曰：「孫武云：『兵貴精不貴多。』一當百，百當千，千當萬，萬無敵矣。狄武襄軍夜破崑崙，只三百甲卒耳；韓忠武敗金人于大儀鎮，劍士千人；楊沂中破劉猊于藕塘，僅百餘人；精也。此選法也。」<sup>70</sup>二《賞》於〈涉江〉篇眉批各有二條，文字簡約，與評語篇幅較長的風格不甚相似，與《文函》眉批、總評內容亦全無重複之處。《文函》總評曰：「屈原〈離騷〉、〈九章〉如〈天問〉等辭，多不可解。讀者不無憚其幽深玄遠。獨此〈涉江〉一章，多直致語，不加潤飾，且砥礪行誼，不能變心以從俗，眷戀宗國，故將愁苦而終窮。萬世以下，猶令人不能已也。」<sup>71</sup>蓋《八品函》之對象讀者與二《賞》不同，非唯文士、學子而已，故卷帙較簡，所收作品亦以淺近直致者為尚。屈作二十五篇，僅〈涉江〉入選，殆其故也。

### 陳仁錫楚辭眉批對舊說的運用

陳仁錫的楚辭眉批採用舊說者甚多，或舉證之，或批判之。如前表所見，採用舊說的形式，又多見於《文賞》。本節即由檢點舊說、文本互證兩方面檢視陳氏眉批運用舊說的情況。

#### 檢點舊說

《文賞》楚辭作品的眉批中，引用了不少前修時賢的論騷之語。其方法之一為標明論家名氏及書(篇)名而直接引用，如〈山鬼〉篇首，眉批即云：「柳子厚〈弔文〉：『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可謂知己。」不過，大多數引文皆僅標論者而已，如〈離騷〉「理弱而媒拙兮」數句，眉批云：「劉知幾曰：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sup>72</sup>此語實出自《史通·載文第十六》：「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不道，其惡存乎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sup>73</sup>又有論家名氏及書(篇)名皆未拈出者，

<sup>70</sup> 陳仁錫：《文品芾函》，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末刊本，〈自序〉，頁一下至二上。

<sup>71</sup> 同上注，卷一，頁十九上至十九下。

<sup>72</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十三上至十三下、六上。

<sup>73</sup> 劉知幾(撰)、浦起龍(通釋)：《史通通釋》(臺北：里仁書局，1980年)，頁147。

如〈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數句，眉批云：「『漢武愛《騷》，淮南作傳』，有以也。」所引文字出自《文心雕龍·辨騷》。此外，尚有間接引用者，如〈離騷〉末眉批云：「劉向尊之為經，司馬遷以〈國風〉、〈小雅〉兼之。」<sup>74</sup>如此之例，不一而足。

陳仁錫引用舊說的目的，往往是為了論證《楚辭》的文本，如前文所舉諸例皆然。不過，以舊說印證文本時，陳仁錫的論述做得更加細緻、新穎，如前引《文心雕龍·辨騷》「漢武愛《騷》，淮南作傳」之語，本眾所周知者。漢武帝喜愛楚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與文化的發展、文學的嬗變及其個人的血緣、品味都有不小的關係。《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記載：「相如既奏〈大人〉之頌，天子大悅，飄飄有凌雲之氣，似遊天地之間意。」<sup>75</sup>而〈離騷〉「前望舒使先驅兮」數句恰在鋪敘屈原在風伯雨師、鳳凰雲霓的屏衛下往見上帝的景象。如此描寫對於〈遠遊〉及後來的〈大人賦〉皆有影響。如郭維森便指出，〈遠遊〉的故國思想、語法音韻與〈離騷〉有一致性，有些學者還認為〈遠遊〉是司馬相如〈大人賦〉的初稿。<sup>76</sup>由此觀之，長達二千五百字的〈離騷〉中，陳仁錫眉批獨在「前望舒使先驅兮」數句上引用「漢武愛《騷》，淮南作傳」之語，雖未必能證明他對〈離騷〉、〈遠遊〉、〈大人賦〉三者間的關係有類似今人的看法，但仍可知道他認為漢武帝喜愛辭賦主要是基於求仙思想。如此寥寥數語或許有以偏概全之虞，但卻就楚辭在漢代的傳播情況提供了新見解。

此外，陳仁錫的眉批引文對今人的楚辭學史研究亦有助益，如前引〈離騷〉末眉批云「劉向尊之為經」，〈離騷〉稱經始於何時，明末至今，眾說紛紜。據魯瑞菁〈「離騷」稱經〉與漢代章句學一文統計，其說有五：（一）屈原自題（清王闈運）；（二）始於屈原弟子宋玉、景差（清陳本禮）；（三）始於漢武帝時之淮南王劉安（明黃文煥）；（四）西漢末劉向編輯《楚辭》之時（明王世貞）；（五）始於揚雄至王充之間的東漢前期（今人李大明）。<sup>77</sup>諸家中，王世貞之生卒年代為最早者，其說蓋出於〈楚辭序〉：「《楚辭》十七卷，其前十五卷為漢中壘校尉劉向編集，尊屈原〈離騷〉為『經』，而以原別撰〈九歌〉等章及宋玉、景差、賈誼、淮南、東方、嚴忌、王褒諸子，凡有推佐原意而循調者為『傳』。」<sup>78</sup>陳仁錫之見，亦應承自王世貞。雖非原創，然據此可知明代嘉靖、萬曆之間，有關〈離騷〉稱經之討論並不熱烈，可考者僅有王世貞一家之說，至崇禎間黃文煥方有新說。

<sup>74</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五上、八下。

<sup>75</sup> 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3063。

<sup>76</sup> 郭維森：〈〈遠遊〉讀賞〉，載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部（編）：《楚辭鑑賞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8年），頁112。

<sup>77</sup> 魯瑞菁：〈「離騷」稱經〉與漢代章句學，《靜宜人文社會學報》第1卷第2期（2007年2月），頁2-7。

<sup>78</sup> 王世貞：《弇州四部稿》（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1983年），卷六七〈楚辭序〉，頁十七上。

抑有進者，陳仁錫引用舊說時，並非無條件地贊同，亦加以有批駁者。如〈思美人〉篇末眉批云：「或曰：『古今文章無首尾者，獨莊騷兩家，蓋皆哀樂過人者也。』恐未然。」所謂「哀樂過人」，即作品帶有強烈的抒情色彩；所謂「文章無首尾」，即作品不太講求起承轉合的章法。陳仁錫所引實為陳繼儒之說，蔣之翹《七十二家評楚辭》亦有徵引。查〈懷沙〉「懷質抱情兮」一句，眉批云：「自古文章家不掩其情質者，屈子一人而已。」〈哀郢〉「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二句，眉批：「平樂可哀，遺風可悲。覽俗之情異乎人也。」<sup>79</sup>知陳仁錫所不認同者，當非「哀樂過人」。

復觀〈惜往日〉「吳信讒而弗味兮」章，眉批云：「頓挫變化。」〈抽思〉「倡曰」，眉批引馮覲曰：「〈離騷〉斷如復亂，而緜邈曲折，又未嘗斷、未嘗亂也。諸篇皆然。」〈懷沙〉「舒憂娛哀兮」章，眉批引陳深曰：「氣如織流，迅而不滯。詞如繁露，貫而不糝。」<sup>80</sup>可知陳仁錫認為屈作諸篇是有章法可尋的，不可以「文章無首尾」一語而含糊概括之。又如〈九歌〉末，陳氏於〈禮魂〉篇眉批道：「揚雄曰：『原也過以浮，浮也過雲天。長卿不及也。』似未盡。」揚雄之語出自《法言》佚文，《文選·〈宋書·謝靈運傳論〉》李善注引《法言》云：「或問：屈原、相如之賦孰愈？曰：原也過以浮，如也過以虛。過浮者蹈雲天，過虛者華無根。然原上援稽古，下引鳥獸，其著意子雲、長卿亮不可及。」劉師培《楊子法言校補》案云：「『然原』以下，似非本書。」<sup>81</sup>蓋以「然原上援稽古」至「子雲、長卿亮不可及」數語出自李善，而非揚雄之言。就前後文來看，所言甚是。無論揚雄或李善，雖稱司馬相如不及屈原，但仍以「浮」字概括屈作。陳仁錫稱此說「似未盡」，當是就「浮」字之論而發。前引《古文奇賞·離騷經》「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數句側批：「顏之推謂原為文常陷輕薄，何其謬歟！」可證陳仁錫不贊同舊說，以屈原為輕薄虛浮。

### 文本互證

除引用前人論騷之語外，《古文奇賞·楚辭》亦好引用其他作品與屈作諸篇進行文本互證。其引用者多為《楚辭章句》及《楚辭集注》所收錄的騷體篇什，如宋玉〈九辯〉、〈招魂〉、景差〈大招〉、賈誼〈惜誓〉、淮南小山〈招隱士〉、東方朔〈七諫〉、揚雄〈反離騷〉、柳宗元〈弔屈原文〉等，此外亦引用了蘇軾〈屈原塔〉詩、〈竹枝歌並敘〉及昔人〈太湖詩〉等，然為數不多。與前文所論述之情況類似，眉批徵引這些篇章時，或標作者，或標題目，或二者皆有，或二者皆無。至於徵引互證的原因，可以歸納為二。其一為文義互發，其二為文思互較。

<sup>79</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三一上、二九下、二六上。

<sup>80</sup> 同上注，頁三二上、二七下、二九下。

<sup>81</sup> 同上注，頁十四上至十四下；蕭統（編）、李善（注）：《昭明文選》（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影印1935年國學整理社影印本，1990年），頁701；劉師培：《楊子法言校補》，載《劉申叔先生遺書》（臺北：京華書局影印民國二十三年〔1934〕寧武南氏刊本，1970年），頁1243。

文義互發方面，如〈離騷〉「何桀紂之猖披兮，夫唯捷徑而窘步」句，眉批云：「〈惜誓〉云：『俗流從而不止兮，眾枉聚而矯直。』」<sup>82</sup>朱熹注〈離騷〉二句云：「桀紂之亂，若披衣不帶者，獨以不由正道，而所行蹙迫也。」又注〈惜誓〉二句云：「枉者自以為直，又群眾而聚合，則其黨盛，而反欲揉直以為枉也。」<sup>83</sup>兩段一言不由正道，一謂揉直為枉、群眾為害，其義自有可互發之處。又如〈抽思〉「矯以遺夫美人」句，眉批引〈招魂〉：「結撰至思，蘭芳假些。人有所極，同心賦些。」亦然。再如〈惜誦〉「情與貌其不變」句，眉批云：「宋玉辭：『秋既先之以白露兮，又申之以嚴霜。』□情貌之變也。」<sup>84</sup>則進一步證明情貌變化的狀態。

文思互較方面，如〈離騷〉「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句，眉批云：「『王孫兮歸來，山中兮不可以久留』，則忍矣。惟美人遲暮至此。」<sup>85</sup>陳氏所引乃淮南小山〈招隱士〉末二句。孫鑛論此篇云：「全是急節，略無和緩。然危語特精峭，咄咄敲金擊玉。」<sup>86</sup>可謂知言。陳仁錫蓋亦認為〈招隱士〉森然可怖，魂動魄悸，與傳統所認知的〈離騷〉怨誹不亂、溫柔敦厚的情調大有逕庭。故此，他將〈離騷〉「羌中道而改路」、「恐美人之遲暮」等香草美人的喻示與〈招隱士〉芳草王孫的淒厲感受相比，不僅呈現出兩篇的情思差異，亦展示出先秦和西漢騷體作品格調的不同。又如〈抽思〉「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句，眉批云：「揚雄〈反離騷〉：『芳酷烈而莫聞兮，不如襲而幽之离房。』又曰：『何必湘淵与濤瀨。』豈知其心哉！」<sup>87</sup>即引揚雄「明哲保身」的責備來顯現屈、揚二人心思上的差距。

### 陳仁錫楚辭眉批的創見與價值

除了徵引前人作品及論騷之語外，陳仁錫在更多的眉批中表達出個人的見解。上文「陳仁錫文學思想考略」一節從四方面討論陳仁錫的文學思想，這在陳氏關於屈騷的論述中亦有所呈現。如陳氏認為「三代以下，誰親君者？誰疾君者？正直忠厚，屈子一人而已」，正是著眼於屈原的經世之用。其稱許屈原從容、謹厚，則與和平之思相呼應。陳氏雖然指出屈原其人其文「厚而正」，卻又不時點撥其中的奇字其句。又其稱〈離騷〉「路不周而左轉」等句有「夾右碣石」書法，〈東皇太一〉「吉日兮辰良」等句為當句對，又稱〈國殤〉「敘殤鬼交兵挫北之迹甚奇，而詞亦淒楚」，可見對情法之並

<sup>82</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一下。

<sup>83</sup> 《楚辭集注》，頁5，155。

<sup>84</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二七上、二二下。

<sup>85</sup> 同上注，頁一下。

<sup>86</sup> 蔣之翹：《七十二家評楚辭》，北京中國科學院藏明天啟六年（1626）忠雅堂刊本，卷八，頁十四上至十四下。

<sup>87</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二八上。

重。為了方便論述，以下從強調屈騷地位、標舉屈原人格、探析作品辭章三方面討論陳氏眉批的創見與價值。

### 強調屈騷地位

自西漢以來，學者對於屈騷可謂褒貶互見。如淮南王劉安、司馬遷推崇屈騷，相信屈原是儒家的典範，〈離騷〉是〈風〉〈雅〉的直系後裔：「〈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sup>88</sup>而東漢班固則道：「今若屈原，露才揚己，競乎危國群小之間，以離讒賊。然責數懷王，怨惡椒、蘭，愁神苦思，強非其人，忿懟不容，沈江而死，亦貶絜狂狷景行之士。」<sup>89</sup>無論稱許還是斥責屈騷，論者大多站在儒家立場，也就是說，在他們看來，屈騷始終是儒家經典的詮釋作品。

然而，陳仁錫提出了屈騷不同於儒家經典之處，如《文賞》眉批云：「『及漢宣嗟嘆，以為皆合經術。揚雄諷味，亦言體同詩雅。』猶未盡其妙。」<sup>90</sup>所引為劉勰《文心雕龍·辨騷》之語。陳仁錫認為此言「猶未盡其妙」，正因為無論是漢宣帝也好，是揚雄也好，都只把屈騷與儒家經術、詩雅相比附而已。在劉勰的基礎上，王世貞在〈楚辭序〉中更揚言：「藉今屈原及孔子時，所謂《離騷》者，縱不敢方響〈清廟〉，亦何渠出齊秦二〈風〉下哉！孔子不云乎：『《詩》可以興，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草木鳥獸之名。』以此而等屈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則已，孔子而遇屈氏，則必采而列之楚風。」<sup>91</sup>認為屈作完全符合孔子對詩的要求，並不遜色於齊秦二風，假如孔、屈相遇，必為相知。

在一般儒者看來，將屈騷列於楚風之論當然是志在拔高。但陳仁錫卻認為，屈騷自有其崇高地位，不待錄入《詩》中方才得人稱許：「物色盡而情有餘者，曉會通也。文其至矣！楚無〈風〉而有〈騷〉，或曰不遇孔子耳。然以彼其人與文，豈一國之風也哉！不錄於《詩》而自存天地間可矣。」為甚麼屈騷是天地間的至文？不在於其體物瀏亮、辭彩粲然，而是因為其真誠流露、抒情性強，並能使古今作者得到共鳴。而屈騷作為至文，不僅不可與六經比擬，其他子、集部的作品也無法相提並論：「以原比左氏、比相如、比揚雄、比莊周，可謂冤極。以宋玉、劉向、王逸諸人之作合為《楚辭》，可謂辱極。」<sup>92</sup>

《左傳》文字富豔，而主旨蓋為以史解經，《莊子》以逍遙齊物、保真全身為貴，二者與屈原的思想大有不同。司馬相如作為辭賦，鋪張揚厲，思想內涵不足，被譏

<sup>88</sup> 《史記》，頁2482。

<sup>89</sup> 王逸（章句）、洪興祖（補注）：《楚辭補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年），頁49。

<sup>90</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三七上。

<sup>91</sup> 王世貞：〈楚辭序〉，頁十七下。

<sup>92</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三七上至三七下、八上。

為「華無根」。揚雄早年步司馬相如後塵而好「雕蟲篆刻」，中年以後則投身儒術，且對屈原的沉江表示不理解。故陳仁錫以為屈原跟他們道不同不相為謀。〈辨騷〉云：「自〈九懷〉已下，遽躡其跡，而屈、宋逸步，莫之能追。」<sup>93</sup>其後學者甚至認為宋玉的作品也無法與其屈作相比。故陳仁錫覺得《楚辭》僅收錄屈作即可，不必以宋玉等人的作品附麗。勉強合為一編，對屈原來說是一種侮辱。換言之，陳氏以為屈騷之無與倫比，非儒家、史家、道家、詞章家、訓詁家之名目可以規範限制。

### 標舉屈原人格

陳仁錫能夠強調《楚辭》獨特的地位，建基於他對屈原人格的肯定和推崇。換言之，對於前人對屈原「狂狷景行」、「露才揚己」、「顯暴君惡」、「不知求周公仲尼之道」等批評，陳仁錫必須作出申辯和反駁。首先，對於屈原的「狂狷」舉動，陳仁錫在《文賞》的〈離騷〉「雖信美而無禮兮，來違棄而改求」處眉批云：「汨羅所以異於洗耳之士。」《子賞》此處亦云：「宓妃無禮，更求賢良。」<sup>94</sup>屈原被放在野，仍孜孜以替楚王物色賢才為務，可謂身在江海而心存魏闕，這與許由等不問世事的隱逸之士的行徑，實在相去甚遠。身處困境而能有這樣的行為，主要源於屈原本身良好的品質。陳仁錫稱讚屈原「生而耿介，天命之已」；又論「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及「和調度以自娛兮，聊浮游而求女」數句道：「和調以自律，浮游以索人，非昭質未虧者能乎？」<sup>95</sup>如朱熹所說，所謂昭質乃光明之質，亦即耿介的品格。而如此品格包括了哪些內涵？《文賞》論〈懷沙〉「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重華不可遯今，孰知余之從容」一章道：「重、襲、謹厚、從容，自寫得意處。」<sup>96</sup>重仁襲義，就是承襲儒家汎愛眾人、捨生取義的思想。如王逸所言：「謹，善也。豐，大也。言眾人雖不知己，猶復重累仁德及與禮義，修行謹善，以自廣大也。」又朱熹云：「從容，舉動自得之意。」<sup>97</sup>可見昭質為何，屈原已自言之。

進一步說，陳仁錫特別著重屈原之「厚」，如〈懷沙〉「內厚質正兮」句，《文賞》眉批：「原之人與文，厚而正。」〈離騷〉「余將遠逝而自疏」句，《子賞》眉批：「忠厚懇惻，可風可雅，蓋遠逝非其志也，況巫咸乎！」<sup>98</sup>陳仁錫指出，屈原念念不忘故君故國，遠行並非其本意，這就是屈原的忠厚之處。又〈抽思〉「人之心不與吾心同」句，《子賞》眉批：「猶欲強人心而同之，其厚之至也夫。」<sup>99</sup>陳氏認為，屈原不僅自心厚

<sup>93</sup> 劉勰（著）、范文瀾（註）：《文心雕龍註》（臺北：開明書店，1993年），頁47。

<sup>94</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五下；《諸子奇賞》前集，卷三五，頁六上。

<sup>95</sup> 《諸子奇賞》前集，卷三五，頁二四下、七下。

<sup>96</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三十上。

<sup>97</sup> 《楚辭補注》，頁144；《楚辭集注》，頁90。

<sup>98</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二八下；《諸子奇賞》前集，卷三五，頁八下。

<sup>99</sup> 《諸子奇賞》前集，卷三五，頁二九上。

正，還希望身邊隨波逐流的人可以和自己一樣厚正，這就是「至厚」。他更認為，屈原的正直忠厚是三代以下極罕見者，如〈惜誦〉「思君其莫我忠兮」句，《子賞》眉批：「三代以下，誰親君者？誰疾君者？正直忠厚，屈子一人而已。」<sup>100</sup>值得注意的是，陳仁錫不僅指出「親君」是忠臣的特點，還提出「疾君」一項。所謂「疾君」，當為「恨鐵不成鋼」的針砭之舉。〈涉江〉「余幼好此奇服兮」句，《文賞》眉批就直接將「奇服」解讀為「忠直」，亦即忠厚正直：「以忠直為奇服，好奇何害？」<sup>101</sup>當世之人立身不正，事君不忠，故忠厚正直者反成稀有，與被眾人視為穿著奇裝一樣怪異。正因如此，身為忠臣的更要振聾發聵，使國君不致身陷泥淖。

至於如何保持君臣間的距離，則端賴「祇敬」。〈離騷〉「湯禹儼而祇敬兮」句，王逸注謂這些受命之君皆「敬天畏賢」；而同篇「又何芳之能祇」句，朱熹解釋為英才化為邪佞後，不能「復敬守其芬芳之節」。<sup>102</sup>故《文賞》眉批此句：「芳而能祇，所以為芳。」<sup>103</sup>換言之，如果不能事君以敬，富於才幹者反而易於為惡，故邪佞所欠缺者乃「祇敬」，而忠良所憑依者也是「祇敬」。由於有「祇敬」的軌範，忠臣在直諫時便可進退得宜。《子賞》於〈離騷〉「汨余若將不及兮」句眉批云：「進修及時，中庸之流也。不得已以狷節著。」<sup>104</sup>孔子謂「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在陳仁錫看來，屈原身居草莽，仍唯恐年歲不居，汲汲自修，這與儒家的中庸之道有相合之處。縱然屈原觸忤君上而遭貶是無可諱言的，但這全然出於不得已之心，故即使稱其狷節，對於其聲名地位卻沒有影響。

### 探析作品辭章

評點文字與原文本共處一個版面，能夠讓讀者在閱讀文本之際，同時理解文章內容和寫作方法。南宋以降，評點一直是文章家樂用的方法。在《文賞》與《子賞》眉批中，除了論述屈原思想者外，從文學角度探析楚辭作品者也為數不少。綜而觀之，可分為文義疏通和文辭賞析兩類。

文義疏通方面，對於原文交代得較簡略之處，陳仁錫往往會在眉批補充。如〈離騷〉「世並舉而好朋兮」句，《子賞》眉批：「非不好朋，無與為朋。」<sup>105</sup>指出屈原斥責舉世所好之朋，乃喻於利的朋黨，並非賢人君子所組成的群體。其次，陳仁錫非常注意詞句的前後文，並藉以進行文義闡釋。如〈湘夫人〉「沅有芷兮澧有蘭，思公子

<sup>100</sup> 同上注，頁二四下。

<sup>101</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二四上。

<sup>102</sup> 《楚辭補注》，頁23；《楚辭集注》，頁23。

<sup>103</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七下。

<sup>104</sup> 《諸子奇賞》前集，卷三五，頁一下。

<sup>105</sup> 同上注，頁四上。

兮未敢言」句，《文賞》眉批：「湘夫人如芷如蘭。」<sup>106</sup>文中所言公子，就是祭祀者要迎接的湘夫人。蓋陳仁錫以「沅有芷兮澧有蘭」既為起興，亦不無比喻之意，故其眉批遂有此語。再次，對於文章首尾呼應，陳仁錫也沒有忽略。如〈離騷〉「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眾芳之蕪穢」句，《文賞》眉批云：「淵明無思，天路本此。」<sup>107</sup>蓋陶詩〈歸園田居〉中有「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之句，故陳仁錫指出，草木零落是天然之事，陶淵明之恐，只是純粹擔心農事。而屈原之憂心，卻一如朱熹所說：「此眾芳雖病而落，何能傷於我乎？但傷善道不行，如香草之蕪穢耳。」<sup>108</sup>持陶詩與〈離騷〉相比對，使讀者更能了解屈原的比喻之意。不僅如此，陳仁錫還會通過眉批來點出篇章的前後照應之處。如同篇篇末「國無人莫我知兮」句又批云：「眾芳萎矣。」<sup>109</sup>提醒讀者正因前文所言「眾芳蕪穢」，導致最後有「國無人」之歎，使全篇的香草美人意象更加得到凸顯。

文辭賞析方面，可細分幾點來談。其一為論遣詞造句，茲舉數例如下：

- 〈山鬼〉「君思我兮然疑作」，眉批：「作字妙，望其君無已也。」
- 〈天問〉「平脅曼膚，何以肥之」，眉批：「一肥字寫紂，其惡肥如此。」
- 〈惜誦〉「惜誦以致愍兮」，眉批：「惜誦奇絕。」
- 〈思美人〉「與纁黃以為期」，眉批：「曠黃奇。」
- 〈惜往日〉「君含怒以待臣兮」，眉批：「含字妙。」
- 〈悲回風〉「編愁苦以為膺」，眉批：「愁亦可編。」<sup>110</sup>

四庫館臣謂鍾惺、譚元春《詩歸》「點逗一二新雋字句，矜為玄妙」，<sup>111</sup>現代學者也認為，《詩歸》的評點特色是「抉隱闡幽，望道有見，觸處洞然，評詩在悟」，<sup>112</sup>陳仁錫亦類似，僅以「奇」、「妙」等字點出作者遣詞造句的不同凡響，卻不進一步申論奇妙之處何在，這就有賴讀者自己的領悟。當然，陳氏討論詞法、句法，並非只有「點逗一二新雋字句」這一種方式而已。如〈山鬼〉「君思我兮然疑作」，《文賞》眉批：「『君思我兮』，再言淒絕。」指出一篇之中「君思我兮不得聞」、「君思我兮然疑作」二句，同樣字面重複出現，顯示出山鬼因對方爽約而產生的淒婉之情。此外，他還會就文

<sup>106</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十一上。

<sup>107</sup> 同上注，頁二上。

<sup>108</sup> 《楚辭集注》，頁7。

<sup>109</sup> 《諸子奇賞》前集，卷三五，頁九上。

<sup>110</sup> 以上引文依次見《諸子奇賞》前集，卷三五，頁十四上；《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十九下、二二上、三十下；《諸子奇賞》前集，卷三五，頁三二上；《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三四上。

<sup>111</sup> 《四庫全書總目》，頁1759。

<sup>112</sup> 毛洪文、鄢傳恕：〈評《詩歸》〉，《荊州師範學院學報》2002年第4期，頁17。

句內容作出一些略帶感發式的評論，如〈離騷〉「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文賞》眉批：「少留將暮，如泣如訴。」又〈湘君〉「恩不甚兮輕絕，交不忠兮怨長」，《文賞》眉批：「足見交態。」<sup>113</sup>皆是如此。

進而言之，陳仁錫的這種評論有時不僅局限於某句，還會就前後文而發，如〈離騷〉「鳳凰既受賂兮，恐高辛之先我」，《子賞》眉批：「求美人難，遭媒更難。」同篇「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美之能當」，《子賞》眉批：「識草木易，識玉難。」<sup>114</sup>兩條眉批各自涉及了兩節文本，而其文字又類近排比，于喁相應，讓讀者更深一層地感受到屈原求賢不遇、壯志不遂的孤寂感。

再者，陳仁錫對於楚辭作品和各朝文學作品的關係也有所究心。首先，他指出屈原作品與前代的傳承。如〈離騷〉「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句，《文賞》眉批：「即『夾右碣石』書法。」知陳仁錫以為〈離騷〉此處模仿了〈禹貢〉「夾右碣石」等語的地理書寫形式。又如〈哀郢〉「憎愠倫之修美兮」句，《文賞》眉批：「文章沉奧，有忠質人之遺，蓋三代法物也。」<sup>115</sup>朱熹云：「愠，心所緼積也。思求曉知謂之倫。」<sup>116</sup>二字較為罕見，故陳氏目為「沉奧」，然以「三代法物」稱之，未免失之武斷。

至於屈作對後世作品的影響，陳仁錫所論則多在〈九歌〉。如〈東皇太一〉「吉日兮辰良」等句，《文賞》眉批：「唐人詩文，或于一句中自成對偶，謂之當句對。《楚詞》『蕙蒸蘭藉』、『桂櫂蘭枻』、『斲冰積雪』，自齊梁以來亦如此。」<sup>117</sup>認為唐人的當句對雖近承齊梁，然《楚辭》中如〈九歌〉諸篇已有這種修辭格。<sup>118</sup>又〈國殤〉篇首，《文賞》眉批：「此篇敘殤鬼交兵挫北之迹甚奇，而詞亦淒楚。固知唐人〈弔古戰場文〉為有所本。」<sup>119</sup>以為唐代李華在創作〈弔古戰場文〉時參考過〈國殤〉。此外，陳仁錫還點出〈雲中君〉與《史記·伯夷列傳》、〈東君〉與唐人描摹太陽、以及〈招魂〉與〈七發〉的關係等，不一而足。可惜限於眉批的篇幅，陳仁錫未就這些問題較詳盡地展開論述，但始終予後人一些具有可能性的研究切入點。

再者，陳仁錫的眉批也有一小部份是純粹抒發個人情感的，如〈哀郢〉「諶荏弱而難持」句，《文賞》眉批：「荏弱難持，說盡小人病痛。」〈懷沙〉「夫惟黨人之鄙固兮」句，《文賞》眉批：「黨人鄙固，黨人偷樂，並快論。」《子賞》眉批亦云：「鄙固酷似。」<sup>120</sup>如此條目雖係評論楚辭文本，蓋亦陳仁錫處於晚明黨爭中感同身受之言。尤有進

<sup>113</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十三下、四下、十上。

<sup>114</sup> 《諸子奇賞》前集，卷三五，頁六下、七上。

<sup>115</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八上、二六下。

<sup>116</sup> 《楚辭集注》，頁84。

<sup>117</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八下至九上。

<sup>118</sup> 「蕙蒸蘭藉」，〈東皇太一〉作「蕙肴蒸兮蘭藉」，若謂當句對，似欠工整。陳氏失檢。

<sup>119</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十四上。

<sup>120</sup> 同上注，頁二六上、二九上；《諸子奇賞》前集，卷三五，頁三十上。

者，陳仁錫的眉批對於楚辭辨偽與編纂問題也略有討論，然數量不多。茲亦於此拈出。陳氏認為，〈卜居〉、〈漁父〉並非屈原所作，故《文賞》不錄。其於《文賞》的〈遠遊〉篇首眉批道：「原文止此矣。〈卜居〉〈漁父〉，世所習譚，故不錄。」<sup>121</sup>認為兩篇係後人紀錄屈原軼事的作品，並非屈原手筆，此說於後世頗有雷同者。至若僅收錄於《子賞》的〈九辯〉篇，篇首眉批云：「此前以為屈子所作，未必然也。乃自屈而外，可傳者此耳。」<sup>122</sup>萬曆年間，焦竑、陳第確曾懷疑〈九辯〉作者乃屈原而非宋玉，<sup>123</sup>而陳仁錫並不贊同二人之說。其原因在於篇中「無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不得見乎陽春」二句。句上眉批：「或謂屈作，非也。屈必不肯作此二語。」<sup>124</sup>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屈原雖然好芳好潔，但流放在外卻並未抱怨衣食艱困，這從〈九章〉各篇可以得知。陳仁錫以「無衣裘」兩句駁斥焦竑、陳第之說，確實獨具慧眼。由於陳仁錫對屈原的重視遠甚於其他楚辭作家，故於《文選》所收錄的騷體篇什甚為不滿。《文賞》眉批：「《文選》自〈騷經〉〈卜居〉〈漁父〉以外，〈九歌〉去其五，〈九章〉去其八，何居？」<sup>125</sup>《文選》所收〈九歌〉篇章有〈東皇太一〉、〈雲中君〉、二〈湘〉、〈少司命〉及〈山鬼〉，〈九章〉則僅收〈涉江〉一篇。陳仁錫蓋認為，《楚辭》與儒家經典一樣，「豈可重以芟夷，加之剪截」，遂有此反問。

## 結語

明代前期，臺閣體獨大，其興起與皇權膨脹、道學獨尊有直接的關係。由於儒家認為屈子行徑有失中庸，《楚辭》文章華而少實，臺閣文臣皆罕言屈騷。明代中葉以後，文衡自臺閣下移郎署，注論評點屈騷的學者雖多，然而臺閣文臣仍然罕有參與。就專著而言，除周用《楚詞註略》外，陳仁錫二《賞》中的楚辭評點可謂表表者。

蔣中同《子賞·發凡》論陳仁錫云：「先生評品古文，微顯闡幽，各有獨見，不相勦襲，揚推必當。」<sup>126</sup>四庫館臣則批評《文賞》議論紕繆，編次不倫，分類瑣碎，去取

<sup>121</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三六上。

<sup>122</sup> 《諸子奇賞》前集，卷三五，頁四二上。

<sup>123</sup> 如焦竑於《筆乘續集》中論道：「〈九辯〉，余定以為屈原所自作無疑，只據〈騷經〉『啟〈九辯〉與〈九歌〉兮』一語，並玩其詞意而得之。近覽《直齋書錄解題》，載《離騷釋文》一卷，其篇次與今本不同，首〈騷經〉，次〈九辯〉，而後〈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居〉、〈漁父〉、〈招隱士〉、〈招魂〉、〈九懷〉、〈七諫〉、〈九嘆〉、〈哀時命〉、〈惜誓〉、〈大招〉、〈九思〉。按王逸《九章》注云『皆解於〈九辯〉中』，則《釋文》篇第，蓋舊本也。以此觀之，決無宋玉所作攙入原文之理。天聖十年陳說之序，反以舊本篇第混並，乃考其人之先後重定之，不知於人之先後，正自舛謬，而後人反沿襲之，可怪也。」見焦竑：《焦氏筆乘》（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年），頁63。

<sup>124</sup> 《諸子奇賞》前集，卷三五，頁四五上至四五下。

<sup>125</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二七上。

<sup>126</sup> 蔣中同：《諸子奇賞發凡》，頁二下至三上。

未審，「蓋務博而不精，好分流品而無緒」。<sup>127</sup> 蔣中同乃陳氏友人，四庫館臣對明人成見頗深，故褒貶或失之過當。近人施蛰存云：「陳氏所選《古文奇賞》、《明文奇賞》俱甚精當，而其所自作記述小文亦都楚楚有致。」<sup>128</sup> 所言較前人為客觀中肯。實際上，蔣中同謂陳氏評書「各有獨見，不相勦襲」之語也非盡虛誇。蓋萬曆以後，諸家楚辭評注皆以集評為主，內容輾轉抄錄者甚多，乃至有編纂者竟毫無己見。而陳仁錫《文賞》雖或引用舊說佐證，但亦時有批駁修正；至於二《賞》中獨出機杼之論，更非罕見。故本文就二《賞》編纂及評注情況作一述略後，即統計分析其眉批數量，復由檢點舊說、文本互證兩方面討論陳氏運用舊說的方式。

至於陳仁錫楚辭眉批的創見與價值，本文則歸納為強調屈騷地位、標舉屈原人格、探析作品章法三端。明末許學夷云：「屈原之忠，忠而過，乃千古定論。今但以其辭之工也，而謂其無偏無過，欲強躋之於大聖中和之域，後世其孰信之？此不足以揚原，適足以累己耳。」<sup>129</sup> 屈原諳熟儒家經典，又生長於楚國，故「謹厚」、「從容」、「耿介」等個性固可能為儒家影響使然。而儒家思想與「卞急少淹雅」的楚文化磨合之際，<sup>130</sup> 自然會產生一些扞格。明代中葉以來，不少學者繼承王逸援屈入儒的傳統，如陳深、汪瑗稱屈原並未投水自盡，劉永澄稱許屈原的自修，何喬遠提出屈原有內省之功，不一而足。唯有許學夷雖然站在儒家立場，卻明白儒家思想不能規限屈原。相比之下，陳仁錫同樣認為，屈騷不必仰仗《詩經》等儒家經典而自能獨立於天地間，有其不可抹滅的價值。他論文著重有情有法、正側俱佳，故在評點屈騷時往往特意撚出文中之情、之法，以及正處、奇處，可見其觀照楚辭作品時，已不欲僅拘泥於中正和平的審美標準。然而在標舉屈原人格時，陳氏則始終脫離不了援屈入儒的傳統，極力稱揚屈原契合中庸之處。觀陳氏後來位至臺閣詞臣，以道統自居，故其只能接受楚辭之奇，對於屈原「狂狷」的個性特質則仍然有意迴避，不予論述。

此外，《史函》所錄〈屈原傳〉總評，可以幫助讀者進一步了解陳仁錫對屈原的看法：「孔子論三仁，蓋各得其本心者也。雖然，以原較比干，均死也。比干之忠，不免商王有殺諫臣之名。屈原之賢，尚免懷王有殺宗臣之惡。當原被讒放逐，既不罹箕子囚奴之禍，又不忍效微子去國之心，行吟澤畔，欲為比干又不欲其主為下受惡。懷沙自殺，清風烈烈，直與三子爭光。百世之上，雖曰仁可也。太史公此傳可

<sup>127</sup> 《四庫全書總目》，頁1762。

<sup>128</sup> 施蛰存：〈無相庵斷殘錄·繡園尺牘〉，載陳子善、徐如麒（編選）：《施蛰存七十年文選》（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96年），頁629。

<sup>129</sup> 許學夷：《詩源辨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34。

<sup>130</sup> 郝敬：《藝圃僉談》，載周維德（集校）：《全明詩話》（濟南：齊魯書社，2005年），頁2875。

為千載知己。」<sup>131</sup>稱許屈原不罹囚奴之禍，不忍去國，不欲其主為下受惡，儼然將屈原地位提昇至殷末三仁之上。

進而言之，陳仁錫此評亦有其針對性，如與陳氏同時的袁宗道論道：「聖人深慮之，故於齊〔管仲〕、楚〔屈原〕二子，但被之忠清之號，而斬以仁。夫固嚴之心，懼其弗真也。或曰：有如真忠清矣，可以為仁乎哉？曰：不然。仁體無所不包。忠與清，仁中一事耳。今夫有木而華實枝葉附焉，指一葉而曰木在是也，可乎？有山而丹砂卉石生焉，指一石而曰山在是也，可乎？」<sup>132</sup>袁宗道根據屈原既有的「忠清」諡號，論「忠清」僅仁之一端，是以「忠清」見稱的屈原不足以仁稱之。故陳仁錫「百世之上，雖曰仁可也」，恰在作翻案文章。且其以孔子稱比干等為「三仁」為基礎，證成屈原之人格作為不在三仁之下，邏輯清晰，條理明貫。對了解二《賞》眉批之意涵，甚有助益。然而可惜的是，二《賞》眉批雖多，卻始終未有出現類似《史函·屈原傳》總評的酣暢之論。此當由於二《賞》僅有眉批、側批，故對屈騷的評價仍有零碎散亂之憾，且論述也不夠深刻。其次，部份篇章的眉批數量過少，以致讀者無法徹底明瞭評注者之意。如前所論〈涉江〉，二《賞》眉批僅四條，篇幅簡略，究其原因，乃陳氏認為此篇「多直致語，不加潤飾」，讀者理解無礙之故。然〈天問〉全篇373句，1,560字，而《文賞》眉批三條，《子賞》僅二條，誠然有比重失衡之疑。

復次，陳仁錫在轉錄舊說時，亦偶有不慎。如《文賞》的〈遠遊〉篇首引舊說云：「忠臣義士，殺身成仁，亦云至矣。然猶追琢其辭，申重其意，垂光來葉，待天下後世之心至不薄也。」<sup>133</sup>題為葉盛說。此段文字出自〈變離騷序〉，葉盛《水東日記》雖有載錄，實乃南宋高元之的作品。其後馮紹祖作楚辭集評時不察，將此文繫於葉盛名下，故晚明諸家皆從之，如陸時雍《楚辭疏》即為一例。陳仁錫讀中秘書，以博學見稱，而不免此疏漏，蓋亦時俗積非勝是之故。

<sup>131</sup> 陳仁錫：《史品赤函》，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末刊本，卷三，頁二十下。

<sup>132</sup> 袁宗道：《白蘇齋類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忠清仁辯〉，頁86-87。

<sup>133</sup> 《古文奇賞》初集，卷一，頁三六上。

## On Chen Renxi and His “Upper Marginal Comments” (*Meipi*) on *Chu ci*

(Abstract)

Nicholas L. Chan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fifteenth century, writers of the *taige ti* 臺閣體 (Grand Secretariat style) rose in prominence in the Chinese literary circle due to imperial patronage and influence of the Neo-Confucian ideology. These writers preferred pure and refined works eulogizing the flourishing ages of harmony, prosperity, and peace. They ignored the ancient poet Qu Yuan (c. 343–c. 277 B.C.) because his personal traits were adjudged lacking the Confucian golden mean spirit, and the verses collected in his anthology *Chu ci* (Songs of the South) were regarded as ornate and depleting substance.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pedagogical court writers still showed little interest in making comments and exegeses on *Chu ci*; Chen Renxi (1581–1636) was an exception. From 1618 to 1626, Chen successively published two works entitled *Guwen qi shang* and *Zhuzi qi shang*. Both works contain the full text of *Chu ci* and Chen’s “upper marginal comments” (*meipi*), which are long neglected but are important in the history of *Chu ci* study. This article seeks to unveil the value of these marginal comments. Part one examines the life, works, and the literary thought of Chen Renxi. Part two explores Chen’s study of *Chu ci*: it scrutinizes the process of compilation and annotation of the two works, assesses the quantity, and analyses the content of the marginal comments. On this basis, it further explores Chen’s study from three directions: first, the status of *Chu ci* in Chinese literature; second, the personal character of Qu Yuan; and third, the literary skills of his poetic works.

**關鍵詞：**陳仁錫 《古文奇賞》《諸子奇賞》《楚辭》 明代文學

**Keywords:** Chen Renxi, *Guwen qi shang*, *Zhuzi qi shang*, *Chu ci*, literature of the Ming dynasty

